

中原抗战记忆

邓小平在晋豫抗日根据地(上)



抗战时期的邓小平。(资料图)

特殊智慧脚踏实地

抗战八年,八路军、新四军越打越强,其中的奥妙让人回味无穷,策略让人深思。这里边包括很多中共领导人的战略思想,邓小平便是其中一个。

1943年1月26日,在中共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小平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在回顾五年来对敌斗争历程的基础上,他提出十大经验,第一条就是,“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竞赛;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

如何斗智?接下来的第二条经验是,“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隐蔽积蓄力量”,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要使敌人看不起我们,要善于采取一切方式去麻痹敌人”。

1944年,进入豫西作战的第一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郭林祥,出发前夕,邓小平听取部队准备工作的汇报,和郭林祥一起研究渡河方案。邓小平提出的主要策略有,“恰当的对敌斗争方法”,“基本是团结一切中国人对敌”,“敌进我进”,“善于利用缝隙钻敌人的空子”,“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领导要统一,步调要一致”,打入敌占区一切组织,长期潜伏,积蓄力量,“善于掌握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一切不夸张、不蛮干、不暴露,脚踏实地地去做”,等等。

1942年2月,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政治部再次下令,明确由每个军分区(旅)组织一个到两个敌后武装工作队,每队30人至50人,由工作能力相当于地委书记或县委书记的干部负责,深入敌后,开展各种工作,建立“隐蔽游击根据地”。

对于这种敌后活动,邓小平进行详细论述,特别强调要“处处力求隐蔽,不夸张、不暴露、不大吹大擂”,“不过于刺激敌人,随时都有坚强的秘密工作的准备”,“在环境于己不利时,或能够增强自己地位时,甚至把革命的一面缩小到最低限度,也是允许的”。

1944年春,日华北方面军共有9个师团先后抽调南下,其中,在八路军晋冀鲁豫地区,战斗力明显减弱。

这样一来,八路军实行“突然跃进”的时机到来。1944年,八路军全面展开攻势作战,共歼灭日伪军18.1万人,解放县城20座、村庄1.2万个,收复国土10余万平方公里。接着,段德文从开辟晋豫抗日根据地入手,详细讲述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贡献。

位置重要“部署甚妥”

晋豫地区,泛指山西南部、河南北部的广大地区,北起临(汾)屯(留)路,南至黄河边,东连晋(城)博(爱)路,西接同蒲路。早在1938年3月,共产党和八路军就在这个地区建立起了抗日根据地。山西“十二月事变”发生后,晋豫地区成为国民党军的驻防区。1941年5月“中条战役”后,八路军总部立即组建太岳南进支队重新开辟晋豫抗日根据地。

在重新开辟过程中,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于1942年3月至6月,深入岳南、中条晋豫地区,在极其艰难条件下,亲自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对敌斗争和各项建设,对重新开辟晋豫区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晋豫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开辟、巩固、发展壮大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晋豫区地处太行、太岳两山南端接合部,中条山和王屋山居于正中,背靠驻武乡、沁县一带的八路军总部,面向黄河鸟瞰中原大地,左右出击时刻威胁着同蒲路和白(圭)晋(城)路两侧,战略

地位十分重要。境内矿产资源丰富,森林茂密、农业发达。由于战略位置重要和自然条件优越,所以,晋豫地区成为蒋介石、阎锡山、日本侵略者争相抢夺的焦点。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晋豫区的战略地位也高度重视。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不久,毛泽东就电示八路军总部:“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脉之晋西南,虽然目前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于比时作适当之部署。”

1938年3月,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决定以阳城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晋豫边抗日根据地。朱瑞把这一构想电告中央及北方局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称“部署甚妥”,并指示:“晋豫边甚重要,望有计划地部署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地区之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在西北两面之行动。”

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1938年3月下旬正式成立中共晋豫特委(后改称晋豫地委、晋豫区党委),统一领导临屯路以南、黄河以北、同蒲路以东、白晋路以西区域内的各级党组织。

挺身而出卓识远见

邓小平参加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时两次路过晋豫区,对这里的地理位置、斗争形势有深刻的印象。他认为,晋豫区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是太行根据地西部的屏障,是开辟豫北和进入豫西的前哨阵地,在晋豫建立抗日根据地,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条战役”,国民党20多万驻军大都退至黄河以南,晋豫地区一时成了权力“真空”。一时间,晋豫境内各种政权丛生,司令多如牛毛,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兵荒马乱、水深火热之中。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令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豫区党委(驻平顺)迅速南下重新开辟晋豫根据地。

1941年7月,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八路军总部立即

兵分两路,开赴晋豫地区创建

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积极准备重新开辟晋豫区的同时,阎锡山的军队也越过同蒲路,乘势向东不断扩张。日军为维护其在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大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频频对根据地进行“扫荡”。

邓小平就是在晋豫抗日根据地重新开辟这样的关键历史时刻来到岳南中条地区的。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他不仅军务缠身,而且作为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还肩负着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根据地的重任,而当时的各抗日根据地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阶段”。邓小平选择这样困难的时间,选择这样危险的地点,亲自到晋豫地区指导工作,不仅体现了他对党中央战略部署的高度领悟和坚决执行,更展现出了一个伟大革命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机智果断自卫反击

邓小平是1941年3月19日抵达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驻地沁源县阎寨村的。在这里稍作视察后,在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等的陪同下,迫不及待地赶赴岳南地区,刚到就遇到了阎锡山六十一军以所谓“收复失地”为名,向岳南根据地发动的进攻。此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对反动派不断制造的摩擦,打还是一再忍让,需要当机立断。邓小平果断地决定,对阎军实施自卫反击。

4月15日,邓小平亲自指挥八路军10个团的兵力发起浮(山)翼(城)战役。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一举毙伤阎军1100余人,初战告捷。当邓小平正准备发起第二阶段战斗时,阎六十一军军长梁培璜急忙派人给邓小平送信,表示愿意团结抗战,和平共处。

邓小平以大局为重,当即决定与阎军谈判,订立抗日作战协定。事后,邓小平告诫岳南的党政领导:“在反对顽固派的摩擦斗争中,不能一味打击,还要做团结抗战的工作。既要斗争,又要团

结,以斗争求团结,斗争是手段,团结是目的。”在以后的长期斗争中,晋豫区的干部群众很好地掌握了这种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策略,成功地团结了友军和一切愿意抗日的势力,沉重地打击了入侵的日伪军。

在岳南期间,邓小平直言不讳地对担负开辟工作任务的岳南地委迟迟未能打开局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了解到当地的红枪会势力很大并且受到日伪军的操纵时,立即指示岳南地委“坚决消灭反动武装红枪会,决不允许其存在”。他亲自领导了处理红枪会的斗争,对首要分子召开宣判大会,处以死刑,对一些认罪较好的胁从分子给予释放,争取多数,孤立、打击少数,稳定了沁河两岸群众的情绪,从组织上瓦解了红枪会,很快建立起抗日的区、村政权。这种务实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使他成为晋豫区各级干部学习的榜样。
 (据《河南法制报》)